

中国知网（CNKI）来源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5, Issue 1 (2019)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九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9辑 /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012-6148-2

I . ①中… II . ①复… III .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 ①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201609号

责任编辑

狄安略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书 名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九辑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5, Issue 1 (2019)

主 编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印张

字 数

344千字

版次印次

2020年10月第一版 202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6148-2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半年刊

主 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 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 编 石源华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泳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 健 复旦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赵卫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 晟 中山大学 薛 松 复旦大学

魏 玲 外交学院

[马来西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编辑部 胡旸昱 张泽宇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电邮: ccrnc@fudan.edu.cn

电 话: 86 21-6564 2939

传 真: 86 21-6564 2939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文科楼 307 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 编: 200433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石源华 / 1

中国周边外交七十年专栏

周边外交视阈下的中国 70 年对美外交.....	潘亚玲 /	11
中国对日外交 70 年述论.....	吴寄南 /	31
中国对印外交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关培凤 /	52
中国对中亚区域外交的历史演进和未来发展.....	张 宁 /	74
中国西亚区域外交：历程、成就与未来抉择.....	郭 锐 /	94
中国对南太平洋区域外交 70 年述论.....	费 晟 /	113

中国周边外交综论

关于中国周边问题的思考.....	张蕴岭 /	137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李 文 刘铭赜 /	14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中国周边学.....	夏立平 钟 琦 /	159

中国周边学笔谈（三）：青年专场

反思与建构：中国周边学中层理论探索.....	蒋建忠 /	177
浅议中国周边学的价值取向.....	薛 松 /	182
中国周边学与东西方外交理论的比较与融合.....	曹 玮 /	187
“中国周边学”的三种解读和创设目标.....	张 群 /	192

中国周边学的新课题：如何为区域提供规范.....	贺嘉洁 / 197
学习者视阈下的中国周边学“十问”.....	张 励 / 201

中国周边专题研究

中国周边经济形势的评估和分析.....	钟飞腾 / 211
“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外构塑.....	马丽蓉 / 238
论新时代海防观的理论来源、内涵及思维方法.....	高新生 / 248

新书栏

中国周边学的提出、推介和研究

——《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前言.....	石源华 / 269
----------------------	-----------

会议综述

第八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	胡晓昱 / 283
---------------------	-----------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95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97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99

Contents

Preface.....	<i>Shi Yuanhua / 1</i>
--------------	------------------------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n the Past 70 Years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the U.S. in the Past 70 Years: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Pan Yaling / 11</i>
A Review of 70 Years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Japan	<i>Wu Jinan / 31</i>
The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India	<i>Guan Peifeng / 52</i>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Central Asia	<i>Zhang Ning / 74</i>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West Asia: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Options for Future.....	<i>Guo Rui / 94</i>
A Review on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South Pacific in the Past 70 Years.....	<i>Fei Sheng / 113</i>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On Solving China's Neighboring Issues	<i>Zhang Yunling / 137</i>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Li Wen and Liu Mingze / 142</i>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Xia Liping and Zhong Qi / 159</i>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Report, Part 3: Young Academics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Exploring Middle-range Theory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Jiang Jianzhong</i> / 177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Xue Song</i> / 182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and Diplomatic Theories of East and West	<i>Cao Wei</i> / 187
Three Interpretations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and Its Targets	<i>Zhang Qun</i> / 192
New Subject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How to Provide Paradigm for the Region?	<i>He Jiajie</i> / 197
10 Questions about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earner	<i>Zhang Li</i> / 201

Research Topics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Zhong Feiteng</i> / 211
BRI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Ma Lirong</i> / 238
On the Origin of Theory, Contents and Thinking Methods of Coast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i>Gao Xinsheng</i> / 248

Reading Recommendation

Preface of Essays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Proposing, Presenting and Studying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Shi Yuanhua</i> / 269
--	--------------------------

Reviews on Symposiums

A Review on the 8th Symposium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Hu Yangyu / 283</i>
--	------------------------

Appendix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Fudan).....	/ 295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97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99

中国对南太平洋区域外交70年述论

费 晟

【内容提要】尽管对南太外交是中国周边外交中较薄弱的环节，但自1972年实现外交突破以来，南太在中国外交考量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南太外交的深度与广度都突飞猛进，实现了较高的制度化建设水平。中国对南太外交的历史性变化是国际及地区局势演变、南太主要国家外交战略调整、特别是中国全面崛起并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等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对南太地区的外交，以发展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为基础，以提升对澳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重点，以强化对岛国的全面交流合作为新亮点，实现了保持地区局势长期稳定及营建外交前沿新支点的目标，也将成为施展并检验未来中国外交成效的新舞台。

【关键词】中国 南太平洋 70年 南太外交

【作者简介】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传统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南太平洋地区是相对次要的部分，在中国的外交大战略中也很少作为一个特定的单元予以考量。本文所说的南太平洋地区（以下简称“南太”）主要是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周边的岛屿国家，大

体与世界政治地理概念中的大洋洲相符。^①

尽管南太地区传统上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心，但近年来其战略地位以及受关注度迅速提升。这种变化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最近20年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壮大，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进入新时期，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包括南太通道建设及合作开发在内的蓝色海洋战略目标日渐清晰，维护海权的意识与能力空前加强。与此同时，建设“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的“南线建设”加速落地。这都使得中国政府对南太地区的关注空前增多，南太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大周边外交的新亮点。^②

一、中国对南太平洋区域外交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外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从局部推进到全面合作的过程。在2012年之前，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格局及南太国家内政与外交局势的变化。在2012年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越来越具有主动性，“主动作为”的态势日益明显。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南太外交及与相关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1949—1971年的孤立期，二是1972—1976年的突破期，三是1977—1996年的成熟期，四是1997—2012年的转型期。

① 国内学界对于大洋洲或南太平洋地区相关概念的最新讨论，可参见汪诗明：《如何界定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太平洋学报》2014年11月第11期。在国际学界，除了南太平洋（The South Pacific）外，“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也是一个常见的地缘政治概念，“大洋洲”则通常指除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外的其余太平洋岛国或地区，与我国的界定并不一致。此外，南太平洋地区也不一定局限于赤道以南，特别是对包括关岛与塞班岛等军事战略要冲在内的密克罗尼西亚诸岛而言。权威且全面的讨论可参见 Paul D’Arcy, “Oceania and Australasia,” in Jerry H. Bentl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45.

② 就中国对南太外交史的研究来说，中澳外交无疑居于中心地位，开拓性的成果，参见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汪诗明：《论中澳关系正常化》，《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第70—80页。在最近十年中，以鲜明的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与分析框架做出的研究逐渐增多，可参见：常晨光、喻常森主编：《中澳关系大趋势：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与展望：纪念中澳建交40周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常晨光、喻常森主编：《中澳关系的历史经验与发展现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Yu Changsen, “The dilemma of interdependence: current features and trends in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6, No.5, (November,2012), pp.579-591；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以南太平洋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聊城大学学者以“列国志”丛书为代表，完成了对南太诸岛国国情与外交的考察，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一) 1949—1971年：邦交孤立期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建交，我国对大洋洲邦交一直处于孤立状态。这主要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冲突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遏制战略的结果。

1949年后关于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澳大利亚需要同时考虑英国与美国的因素。英国做出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决策后，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也要考虑这一问题。但与英国不同，美国就承认新中国态度消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与美国已经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形成同盟关系，同时，执政党工党面临大选，要防止反对党对其“染红”的指控，澳政府最终向美国立场靠拢，暂缓与中国建交。新西兰的立场与澳大利亚的有所不同，承认新中国并非不可接受，但是决策者担心这会损害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因此也放弃建交努力。^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意识形态偏见逐渐扭曲了澳大利亚对新中国的认知与外交政策，我国予以了激烈回击。1951年9月，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三国正式结成同盟，中国与南太地区发展外交关系的大门被封堵。至1972年中澳建交前，《人民日报》通常使用“仆从”“侵略者”“同谋犯”“帮凶”等激烈措辞形容澳政府。^②

对此，中国对澳、新外交主要采取了政党外交的形式，对象主要是澳大利亚共产党与新西兰共产党，特别是频繁邀请澳共、澳共（马列）及新共访华。^③ 1963年，在中苏分裂的大环境下，新西兰共产党公开表态支持中共的立场，也是西方国家共产党中唯一做出这一选择的。^④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澳大利亚工党大体保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积累了许多善意。工党在1957年由副党魁率领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代表团政见时表示，没有限制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是中澳双方都需要维持并加强的，

^① Anne-Marie Brady, “New Zealand-China Relations: Common Points and Difference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0, 2 (December 2008), p.5.

^② 张祖兴、喻伟：《建交前中国队澳大利亚的认知》，第10页。

^③ 新华社：《澳众院通过反共法案，企图解散澳共镇压人民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5月26日，第4版。

^④ 在1960年后，新西兰共产党的核心成员规模仅有50人左右，新西兰政府认为其不构成政治和社会威胁，因此不干涉其与中共来往。Anne-Marie Brady, “New Zealand-China Relations: Common Points and Differences,” p.7.

对工党承认新中国并支持恢复其联合国合法席位表示认可，但绝不接受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①这一鲜明表态对工党后续制定对华战略起到了积极的指南作用。

此外，尽管官方政治关系紧张，但民间交流并未中断，中澳双方经贸关系没有完全停止，新中国一直大量购买澳大利亚小麦。新西兰则在1956年成为第一个停止对中国经济禁运的西方国家。1958年，新西兰工业与商业部代表团秘密访问中国，推动双方贸易，中国也予以支持。^②

总体而言，1972年前，中国对南太外交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总体关系紧张，意识形态考量主导双方的官方政策。第二，政党外交为主要交往内容。无论各自官方立场如何，中国对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共产党的交流是持续而稳定的，但是具体内容是“请进来”而不是“走出去”，战术需求多，战略考量少。第三，中国对该地区保持了基本的民间交流，尤其是经贸交流没有中断，这使得双方保持了一定的沟通渠道，为日后关系的突破与恢复创造了基础。

（二）1972—1976年：邦交突破期

这一时期，中国对南太外交出现了突破与发展，最重要的事件就是1972年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实现关系正常化，随后，又与南太地区主要的新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美关系变化以及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

面对越战泥沼，1969年7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访问关岛时提出了尼克松主义，客观上给盟国开展独立外交提供了空间。但澳大利亚对美国立场的变化缺乏敏感度。1970年3月，澳大利亚新外长威廉姆·麦克马洪在议会发表讲话时依然反华。同年10月，麦克马洪依然拒绝中国重返联合国，并表态支持台湾。

对此，中国政府并非听之任之。恰逢中国购买澳大利亚小麦的协议已经期满，中方没有表现出希望续签协议的迹象，同时开始积极转向从新建交的加拿大进口小麦。这在澳大利亚引起了极大震动。1971年2月，尼克松在国会发表讲话，坦陈了与北京对话的意图，令澳大利亚政府倍感尴尬。5月27日至7月

^①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下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524—1525页。

^② Anne-Marie Brady, “New Zealand-China Relations: Common Points and Differences,” p.7.

2日，中澳两国在巴黎首次举行正式对话。但是，澳大利亚坚持“两个中国”政策以及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此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政权代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在没有解决外交承认的情况下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澳大利亚试图复制这种模式，但中国政府立场非常鲜明，要求中澳关系正常化必须确立“一个中国”的原则。对此麦克马洪政府无法抛弃自由党传统的意识形态偏见，又不能无视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局，进退失据。

1971年6月27日到7月14日，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惠特拉姆获中方邀请率代表团访华，麦克马洪当局对此气急败坏。孰知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基辛格正在访问中国，而他本人也将于次年访华。由于对尼克松的讲话毫无思想准备，麦克马洪的政治判断力饱受质疑，最终在1972年的大选中遭受惨败。澳大利亚工党新政府重视对华关系。1972年12月6日，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代表工党新政府同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开始了首轮建交谈判。12月19日，惠特拉姆就任总理，新政府最先颁布的政策之一就是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2月21日，双方签署建交公报，中澳双方关系正式恢复正常化。^①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中澳关系的正常化，1972年12月22日新西兰也正式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中国实现与澳、新关系正常化后，由于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的原则，强调第三世界认同，中国也迅速赢得了新独立岛国中体量较大者的认可。1970年10月10日独立的斐济共和国在1975年11月5日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小岛国，同年11月6日，南太第一个实现独立的岛国萨摩亚也紧随斐济与中国建交。1975年9月16日，南太最大的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次年10月12日，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三个国家的面积与人口，在整个南太岛国群体中占有绝对的权重，标志着中国外交在南太岛国影响力的绝对提升。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南太地区外交局面的突破与发展，首先是1970年前后大国关系调整连锁性反应的结果。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助力。其次，中澳关系的改善与澳大利亚逐步采取独立外交有重要关系，尤其是与1949年至1972年长期在野的反对党工党的积极努力有关。工党正视发展中澳关系的意义，这不仅符合现实需要，也改变了澳大利亚政治意识形态上“恐红”，文化意识形态上“恐黄”的传统。最后，中澳、中新以及中

^① 汪诗明：《论澳中关系正常化》，《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第78页。

国与重要小岛国的建交也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以及国际威望提高的自然结果。

（三）1977—1996年：邦交成熟期

十年动乱后，中国外交事业获得新生，与南太地区的外交突飞猛进。总体来说，中国积极发展与南太平洋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加强政治磋商，还特别在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方面加强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对澳、新两国外交关系还增加了一层特殊的含义：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典范。到1989年，“加强同西欧各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友好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长期方针”。^①

就具体表现看，在这一时期双方高层访问实现了从无到有且积极走出去的明显变化。从1977年开始，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访问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为开端，中国国家领导人开始经常性地访问澳大利亚与新西兰。1985年4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发表《关于中澳经济合作的新闻公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南太。此后，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利用各种国际会场，尤其是联合国会议、APEC领导人峰会及东亚峰会等活动，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领导人进行交流沟通。

1977年以来，中国对南太平洋国家经济技术与贸易往来的重大进展包括：1978年，澳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新西兰则成为第一个让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特惠关税待遇的国家。1981年，中澳两国签订《经济合作协定书》和《促进发展技术合作计划协定》，还签署了《中澳文化合作协定》。1987年，新西兰副总理帕尔默访华，并签署《中国与新西兰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88年，中澳双方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②

这个时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明显展现出了独立外交的姿态，以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为己任，包括发起成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同年，新西兰

^① 崔越、牛仲金：《试论中国的对澳大利亚政策——基于“中等强国”行为逻辑的认知》，《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2期，第76页。另可参见汪诗明：《全面深化的澳中关系——20世纪80、90年代澳中关系评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7页。

^② 上述中澳、中新双边交往中的大事编年均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澳大利亚的关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242/sbxg_681246/；《中国同新西兰的关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940/sbxg_681944/t7878.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29日。

工党政府提出要与中国发展“特别关系”。随后几年中，中国官方及学界均赞扬了新西兰在反核、推动区域一体化、维持地区稳定以及积极援助第三世界的政策。^①

1985年4月，澳总理霍克在众议院讲话中强调，澳大利亚与中国正在发展“特殊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在反核问题上与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的严重分歧，新西兰实际上退出了《澳美新同盟条约》，使得它在对华外交上更具有独立姿态。中国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之后，新西兰1990年上半年首先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1991年2月，澳大利亚也宣布取消1989年7月以来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

1991年冷战结束，同年12月上台的澳大利亚新总理基廷逐步提出了“脱欧入亚”的理念与政策，希望澳大利亚与亚太国家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发展为互惠互利以及在地区性事务中密切合作的伙伴关系。^② 具体表现上看，中国与澳大利亚首先进一步扩大了经贸合作。^③ 其次，中国和澳大利亚合作加入多边合作组织并发挥重要作用。1994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明确判断中国会在15年后成为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成为全球权力结构和亚太战略格局重塑的最关键因素。澳大利亚坚持多边外交，无意提升美澳同盟，反而劝说美国与日本对华接触，接纳中国进入多边合作组织，反对将最惠国待遇与所谓中国人权问题挂钩。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高度肯定，并且抓住这一契机，拓展了在南太地区及国际组织中的活动。

在这一时期，中国继续与大洋洲新独立的小岛国建立外交关系，包括1980年的基里巴斯、1982年的瓦努阿图、1989年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以及1990年的马绍尔群岛。太平洋岛国普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基础设施弱，交通不便，而中国坚持在各建交国建立使馆以示尊重与重视。

总体来说，在中国对南太外交创建后的25年里，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以经济合作为切入点，以增强综合国力为目标，与南太地区主要国家初步找到了利益互补之处以及国际战略共识，支持并参与澳、新等国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努力。中国对南太地区的外交日趋成熟，以推动经贸和科技合作为重

^① Anne-Marie Brady, “New Zealand-China Relations: Common Points and Differences,” p.7.

^② 参见张秋生：《20世纪末澳大利亚“脱欧入亚”提法的辨析》，《学海》2008年第5期，第166—169页。

^③ 侯敏跃：《澳美同盟对中澳关系的影响：从基廷到吉拉德》，喻常森等编：《中澳关系的历史经验与发展现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

点，以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组织活动为手段，实现了政治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南太成为中国“密切合作”的对象。

（四）1997—2012年：转型期

在这一时期，南太平洋国家对外战略出现分化，中国外交形势也相应改变。主要是澳大利亚调整了外交战略，激进的“脱欧入亚”被放弃，转而形成了一种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不断重新靠拢美国，同时在经济贸易领域扩大并深化依赖中国的双轨制战略。中国外交开始不定期地面对“中国威胁论”带来的政治摩擦，但也继续扩大经贸及人文交流。与中澳关系不同，中新关系在这一时期继续保持平稳友好的关系，甚至持续升温。在这一时期最意外的变化在于，南太岛国前所未有的成为中国外交斗争的战场。

政治外交：1996年3月，以霍华德为首的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党开始了11年的长期执政，期间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延续并推进了工党政府的战略，即拓展合作、互惠互利，但是他反对“脱欧入亚”的政策，认为这忽视和损害了澳大利亚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他对前政府推动的多边主义政策也多有反对，提出了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指针。霍华德重申与美国的安全同盟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9·11事件”之前，霍华德政府亲美姿态与日俱增，如在2000年7月签署条约支持美国在东亚地区开启并部署导弹防御计划，我驻澳大使周文重公开声明表示反对。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后，澳大利亚公然为美国站台。7月底，又通过外长发起美、日、澳、韩开展四国安全对话的倡议。^①但在“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改善，澳大利亚对中国外交与美国开始保持一定距离。

2007年12月，会说中文的陆克文率工党重新执政，中国政府及国际舆论认为中澳关系有可能全面回升，尤其是政治上可能重新出现亲华姿态。^②但事实上工党政府与霍华德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明显政策差异。陆克文在2008年4月提出要做中国的“诤友”，主张双方进行开诚布公的政治对话，但中国政府并未积极回应。因为在西方占据国际政治话语优势的情况下，“诤友”很大程度上具有“西方优越论”的窠臼，而且“诤友”的前提是心心相印，中澳关系在当时根本达不到这一点。

^① 侯敏跃：《澳美同盟对中澳关系的影响：从基廷到吉拉德》，第152—164页。

^② 《陆克文：我要做中国的诤友》，人民网，2008年4月14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2020/74689/120414/7119011.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30日。

2009年，中澳关系出现了建交以来的第一次急速下滑，几乎跌进谷底。首先是中国新年后，澳大利亚国防部公布新版《国防白皮书》，首次明确将中国当成是澳大利亚的潜在威胁，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与批评。^① 7月，又爆发了“力拓案”。^② 澳大利亚政府与民间舆论普遍认为，此案是中国政府对中国铝业公司稍前并购力拓股份遭拒所实施的打击报复。“力拓案”爆发后，“疆独”分子热比娅窜访澳大利亚，受到澳大利亚媒体的热捧。7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召见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就热比娅窜访澳大利亚表示严正关注和坚决反对，要求不准许热比娅在澳大利亚境内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中澳两国主流媒体在当年围绕上述事件展开了一场舆论大战。^③ 2010年6月，吉拉德总理取代陆克文继任总理，并没有改变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的敏感度。

尽管霍华德至吉拉德政府时期中澳外交出现上述波折，但双方仍然保持了密切的高层互访。中方比较重要的访问包括：1999年，江泽毛主席正式访问澳大利亚，分别与澳总督迪恩、总理霍华德等澳领导人会见、会谈。双方同意建立中澳两国领导人以及两国外长之间一年一次的定期会晤机制。2003年10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澳进行国事访问，就深化中澳全面合作关系与澳领导人达成共识。从1997年开始，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先后6次应邀访问中国。2008年，陆克文总理首次正式访华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8月，澳总理陆克文、总督杰弗里先后来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2011年4月，澳总理吉拉德访华，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会见会谈。^④

相比于澳大利亚，新西兰政府在这一时期坚持了对华友好的姿态，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与中澳关系出现波折时，不仅不选边站，甚至与中国一样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等行动表示公开批评。2004年，新西兰外交与贸易部甚至更新了作为新西兰外交最重要基石国家与地区名单，中国首次出现在相关名单里，中方

^① 可参见胡欣：《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观与“中国威胁论”——解读澳大利亚2009年度国防白皮书》，《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

^② 2010年3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因为“力拓案”四名案犯的犯罪行为，使中国企业在铁矿石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仅2009年就有逾20家中国钢铁企业为铁矿石进口多支付了10.2亿元人民币。

^③ 喻常森、常晨光：《中澳关系面面观：写在中澳建交40周年之际》，喻常森、常晨光编：《中澳关系大趋势：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与展望：纪念中澳建交40周年》，第42页。

^④ 上述事件均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澳大利亚的关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940/sbx_681944/t7878.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29日。

对此表示了高度赞赏。^①

这一时期，中国在南太岛国的外交一度面临重大挑战，主要在于台湾民进党当局“烽火外交”的实施。“烽火外交”是台湾当局于2002年7月18日首次提出的。主张在国际社会集中火力，全力出击，争取“外交”的突破，让中国大陆忙于应付，无暇他顾。^②2002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与瑙鲁建立外交关系，后者对台断交。陈水扁当局于2003年11月策动基里巴斯与中国断交。2004年12月，台湾当局甚至试图破坏瓦努阿图与中国大陆的正常关系。2005年5月14日，因为债务困境与金元贿赂，瑙鲁再次倒向台湾当局，5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与瑙鲁断交。除了“邦交”争夺，陈水扁还4次访问台湾“邦交国”，招摇过市，中国政府对此予以坚决抨击。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采取了理智的“活路外交”战略，大陆随之也外交休兵。

尽管台湾当局在南太地区有6个所谓“邦交国”，但都是南太地区人口、面积及经济体量最小的国家。即便在“烽火外交”的干扰下，中国政府在南太的主要邦交岛国也未出现动摇，这进一步说明中国在区域内的国家声望及外交成熟性。

经济、科技与人文外交：与政治外交领域的波折演进不同，中国对南太的经济与文化外交始终活跃而紧密，成果不断扩大。最重要的事件包括：1999年7月，中澳正式结束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2000年5月，两国正式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02年12月，中新两国签署《中新关于教育与培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3年10月，胡锦涛主席访新期间，双方签署相互承认高等学历和学位证书的协议。2005年5月，中澳启动首轮自贸协定谈判。2008年4月，中新两国续签《关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并将之升级为两国政府协议。2010年6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澳。7月，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访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中国与新西兰战略研究联盟”。10月，中新签署《关于中国与新西兰合作研究基金的联合声明》。2011年4月，澳吉拉德总理访华，并签署中澳《教育交流备忘录》和《相互承认高等教育文凭和学位证书协议》等文件。

这一时期，中新两国经贸合作制度建设的成果格外突出，新西兰成为第一

^① “MFAT Statement of Intent 2004/05,” Wellington, 2004.

^② 杨卓娟：《“烽火外交”与“活路外交”比较分析》，《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36页。

个与中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2004年4月，新西兰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5月，中新双方在奥克兰正式签署《中国—新西兰贸易与经济合作框架》，双方决定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行性研究。11月，胡锦涛主席与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就结束中新自由贸易协定（FTA）可行性研究达成一致。12月，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式启动。2008年4月，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10月，协定正式实施。^①

这一时期，中国对南太岛国经济交流开启了制度化建设。2005年10月中国倡议建立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简称“中太论坛”），赢得太平洋岛国广泛响应。2006年4月，中太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斐济召开。会上，中国同8个建交岛国共同签署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行动纲领》。^②

总之，在中国对南太外交的转型时期，尽管因为澳大利亚采取了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双轨依赖战略以及台湾当局的“烽火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和波折，但是双方深化交流与合作的总体态势并未曾改变，中国在南太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尤其是对新西兰外交表现出了平稳性和持续性。

二、新时代中国南太区域外交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对南太外交出现了新局面与新气象。最明显的变化在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对外战略顶层设计的清晰化，中国对南太外交日益具有主动性，且战略考量明显增多。从实际操作看，中国的南太外交能够综合国内需要与国际环境变化，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对岛国外交空前活跃。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① 上述事件记录均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澳大利亚的关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242/sbgx_681246/；《中国同新西兰的关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940/sbgx_681944/t7878.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29日。

^② 《中国与建交的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人民网，2014年11月22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122/c157278-26074017.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1日。

包括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①由此，中国与南太地区进入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海洋战略前所未有地上升到中国外交大战略的高度。而南太国家都是海洋国家，毫无疑问成为检验“蓝色海洋”战略能否真正实现的试验田。

新时期中国外交领域对南太的关注与投入不断增加。一方面积极补充积累南太国家基本知识，在实践中探索新思路与新内容；另一方面开始寻求确立相对专门的外交对策，实现两种区别：一个是将对南太外交与对美外交相互区别，另一个是将对澳大利亚外交与对新西兰及南太岛国外交相互区别。

（一）扩大共识的对澳态度

南太内部各国发展极不平衡，在外交领域表现为，大部分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非常低调，但自诩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则异常活跃。对此中国政府也予以了有针对性的了解体谅态度。中方认识到，从意识形态和地缘关系历史的演变来看，澳大利亚对美国和中国两面下注注定了其外交政策纠结反复的特点，与我发生矛盾具有必然性。此外，澳大利亚的综合国力较强，对其南太邻国具有压倒性优势，因此中国能够理解澳大利亚对国际事务保持相对高调活跃的参与，同时在南太地区事务中传统上具有相对主导性与敏感性。中国并未将澳大利亚社会不定期爆发的对华负面言行判定为战略对抗，而是对中国快速崛起不够适应的表现。中方能够看到澳大利亚国内政治意见的多元化，反华舆论的沉渣泛起与其近年来政党政治内耗有关。

中国的善意与坦诚是一以贯之的：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里斯班峰会，并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专程访问了相对偏远的塔斯马尼亚州，从细节上表达了对澳大利亚人民的尊重和亲近，赢得澳媒体的一致好评。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澳进行正式访问。^②

^①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30日。

^② 《李克强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第六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中国外交部网站，2018年11月14日，http://embassy-saudi.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lzlz/lkqcxshhzldrnlhy_695103/zxxx_695105/t1613141.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30日。

（二）大是大非绝不妥协的原则

谋求扩大共识，绝不是无原则的容忍。尽管我国政府对其民间舆论的歪风能够淡定对待，并不一概做出强烈政治回应，但也绝不容忍澳大利亚放任反华舆论兴风作浪。首先，对于沉渣泛起的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予以坚决反击，维护海外华侨权益。其次，对于明显跟风美国的挑衅言行，尤其是在涉及南海问题等并不属于南太地区内部事务的议题上，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澳大利亚火上浇油的言行。最后，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放纵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予以坚决抨击。自2017年起，澳大利亚媒体大肆炒作“中国收买澳大利亚政客”“操控华侨”及“渗透澳洲学术界”等议题，引发两国媒体舆论战。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反外国干涉系列立法也被广泛认为剑指中国。对此，中方以暂缓双方高层交流的态度予以回应，同时开展公共外交，阐明中澳合作的友好历史与现实成果，引发澳大利亚有识之士的舆论反弹。最终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做出主动示好的公开演讲，宣告双方关系回暖。

（三）强化政治与安全问题高层沟通制度

从2013年开始，中国与澳大利亚定期举办“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2013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与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举行会谈，正式启动中澳总理年度会晤。中澳关系2013年被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新举措是中方提升双方沟通水平、确保充分交流、全力寻找共识、避免决策误判的重要努力。^①

在新时期，中澳军事交流制度建设也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澳大利亚甚至成为中美军事交流的一个媒介。2012年10月，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军队在澳共同举行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次年，扩大为中、澳、新、美四国联合参与四边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室内推演。从2015年8月开始，中方派员赴澳参加“科瓦里-2015”中澳美三边陆军联训和“熊猫袋鼠-2015”中澳双边联训，此后行程每年按照惯例演习。

^① 《外交部：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沟通交流始终畅通》，中国新闻网，2018年8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8-01/8586492.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30日。

（四）推动对澳新高水平经济合作

中国政府非常敏锐地察觉到南太地区的两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支持国际自由贸易体制与坚持市场开放方面与美国存在深刻分歧，因此，中国政府以坚持自由贸易原则为抓手，推进与澳新的全面经贸合作。对澳方面，最明显的创新是双方建立了自贸协定（FTA）。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澳大利亚，与澳总理阿博特共同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贸协定谈判。2015年6月，双方在堪培拉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澳自贸协定。12月，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生效。

新时期中国与新西兰的经贸合作制度建设和实际成果都创新高，突破不断。2015年，新西兰成为亚投行（AIIB）首个发达国家创始会员国，并率先注资，还成为第一个与中国达成影视剧合作制作与播放协议的国家。2016年，中新联合宣布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五）推动多边合作，提升互信的新战略

南太地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除澳新之外，小岛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最不发达国家，因此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小岛国普遍追求经济发展、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推动多边合作，提升互信。对新西兰方面，2013年，中国首次采用与三方合作的形式，与新西兰、库克群岛共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受到普遍好评，为中国对外投资与援助创造了行之有效的新模式。2014年，中国将中新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表建交以来首份双边关系联合声明。^①2015年，新西兰总理特使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说明新西兰对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历史贡献的高度认可。

对南太岛国方面，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不仅维持了既有的邦交，还通过依托战略支点国家如斐济、萨摩亚及瓦努阿图等国，打造南太“朋友圈”。自1985年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萨摩亚、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5国后，中国开始将后3个国家以及瓦努阿图作为南太岛国外交的重心。1990年，中国成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

^① 《中国和新西兰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新网，2014年11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1-20/6799231.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29日。

对话伙伴，在新时期，这种关系进一步得到全面升华。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后，对斐济进行了国事访问，还灵活利用访问斐济的机会在楠迪同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①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利用APEC首脑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契机，习近平主席再次与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发表演讲，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很显然，中国对南太岛国外交不仅强调政治与经济利益，更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身份与历史认同，推动“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

（六）打造“一带一路”南太岛国战略支点

对南太岛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合作，成为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的核心内容。首先是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比太平洋岛国，中国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而太平洋岛国拥有市场和需求，双方合作互补性强。其次，是协商对话展现新前景。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的作用不断提升，成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协商对话的主要平台。2013年11月和2019年10月，中国广州与萨摩亚阿皮亚先后举办第二届、第三届论坛，巩固和提高了既有战略合作态势。此外，中国与南太岛国还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致力于消除分歧和开拓合作。^②

总体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南太地区国家以来，中国对南太外交推进了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实践。中国在南太地区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实现了远超过经济领域的多样化收益。尤其是在对南太岛国外交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完全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中国全面拓展发展中国家外交积累了丰富有益的经验。

三、中国对南太区域外交的问题与展望

在中国对南太国家40多年的交往过程中，问题与挑战从来不曾消失。由

^① 《习近平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网，2014年11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23/c1024-26075169.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29日。

^② 徐秀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迎来新机遇》，《社科院专刊》2018年第451期。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guojiyanjiuxuebu/201809/t20180907_4556321.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29日。

于南太地区在中国外交中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中国政府及学界对该地区基本国情，尤其是历史文化与政治传统了解不深。此外，由于长期以来视其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附庸式存在，中国政府对其外交可能的独立自主性认识不足，有时出现简单化或低估化的反应，这都是未来外交中需要周详处置的。21世纪以来，许多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不定期地爆发，干扰中国对南太外交实践。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在深化双方交往过程中积累并显现的，中国还亟待积累应对经验。

（一）中国对南太区域外交面临的挑战

1. 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掣肘

需要明确的是，澳大利亚乃至新西兰对中国崛起的紧张，“中国威胁论”的抬头，很大程度上属于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成长和“有所作为”的外交姿态不适应的结果，不能简单视其为追随美国对华战略的产物。澳大利亚对中国乃至亚洲战略决策的基本因素在于对自身力量的脆弱感。因此，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给澳大利亚带来最大安全感的稳定制度安排，澳方不可能轻易放弃。同时，中澳关系在各自整体外交考量中的权重从来都是不对称的。

具体表现是21世纪以来，无法否认和阻挡中国的全面崛起，但又始终无法泰然处之。澳大利亚一直期待中国会被纳入其所习惯和接受的既有国际与地区秩序安排中。当中国明显展示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能动时，澳大利亚就陷入不心甘情愿，又无可奈何的状态，明知反华言行注定徒劳，却又按捺不住聒噪。此外，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充当美国在南太秩序的维护者，这使得中国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受美国掌控的质疑具有历史合理性，双方达成战略互信难度极大。

就对澳外交而言，问题不仅在于涉澳事务重要的变化，更在于接受中澳两国对深化政治经济关系有不同认知的现实。对中国而言，澳大利亚是中国最主要的原材料进口来源之一，中国积极推动与澳大利亚的各项经贸合作。然而，澳大利亚方面对两国关系的深化，有着较为复杂的心态。虽然企业界基本欢迎中国扩大对澳投资的立场，但仍有很大比例的政治人物与意见领袖持有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中澳之间的种种纠纷。不仅如此，过去10年，澳大利亚朝野两党以及执政党内部纷争不休，经常通过炒作中国“干涉问题”来博眼球、求选票。而经济危机后澳大利亚基层社会种族歧视文化氛围以及民粹主义保守势力沉渣泛起，也会损害中国对澳外交的积极成效。

澳大利亚倒向美国未必是后者逼迫诱导的结果，恰恰可能是因为澳大利亚担心美国削弱对南太投入乃至弱化美澳同盟，自己会被迫重新选择安全依附对象。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崛起可能始终无法持全面接受态度。

2. “一带一路”建设可能的风险与争议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均表示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与接受，但由于已经存在自由贸易协定（FTA）这样的高水平合作框架，它们实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没有特别积极的响应。海上丝绸之路的“南线建设”，很大程度上还是针对南太岛国展开的，而当地的问题包括：政局不稳定、治安环境恶劣、土地所有权纠纷复杂、民粹思潮对外来资本的抵制、政治腐败以及法律制度不完善等。此外，这些地区通常也是部族关系复杂且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这都需要中国在推进项目合作时管控综合风险。

2009年开始爆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瑞木（Ramu）镍矿问题就是一例。这个项目是由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澳大利亚太平洋高地公司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共同建立的合资企业。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反对中国企业及其员工来建设镍矿，还质疑前总理索马雷给予中国冶金科工公司的优惠投资条件缺乏透明度以及该公司的环境和人权记录。2009年5月，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在矿山建筑工地上发生冲突，引发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范围内的反华骚乱和洗劫华人商铺。2014年8月，当地居民再次武装袭击了矿山工地，致使5名中国工人受伤，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巴新马当省的太平洋海洋工业园区计划也遭遇类似问题。这个工业园区有望成为南太地区规模最大的金枪鱼捕捞和加工中心，但是当地居民认为它会对环境和传统生活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强烈反对。该工业园区计划被搁置数年后，由于国家财政赤字日趋严重，政府又重新关注这个项目。反对者则认为该项目将会破坏马当潟湖和具有高生物多样性的海域，并会打乱当地村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2015年6月，马当市反华游行中发生的暴力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大批亚洲商店遭受洗劫。^①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岛国的推进，还要面临建设质量监控、投资项目

^① 翟崑、周强、胡然主编：《一带一路案例实践与风险防范：政治安全篇》，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年，第237—239页。

是否造福于基层民众、所建项目是否不造成当地环境破坏以及建筑项目本身是否适应当地湿热的热带海岛环境等一系列的问题。一旦问题被国际媒体渲染放大，甚至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类似项目造成困扰。

3. 澳新对中国在岛国影响力扩大的抵制

作为地区大国的澳大利亚长期在南太平洋地区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虽然澳大利亚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但是在南太岛国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干扰，增加中国活动的成本，并非其能力所不及。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的利益较为明确，主要是防范外来势力渗透，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及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并不认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是一种必然的威胁，但是澳大利亚的担忧仍然有增无减。^①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孙芳安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活跃，也表示了安全方面的担忧。在她看来，中国不断加强的援助活动，是中国在该地区提升影响力的一个方式，而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正在无形中改变南太平洋地区的传统力量对比。2018年，新西兰国防部长罗恩·马克发布一份战略性国防政策声明，罕见地点名批评中国的南海政策，与新西兰政府一直避免批评中国的姿态大相径庭。^② 2018年9月，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及太平洋各岛国签订新安全合作协议，正式将新西兰纳入强化对岛国事务的管控计划中。^③

4. 台湾当局可能的挑衅

鉴于“烽火外交”的历史，尽管台湾当局在争取“国际邦交”的问题上能力和意愿都大大下降，但是仍然不能排除其采取小动作的可能，尤其是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不利的情况下，可能孤注一掷，通过主动挑衅，分散中国方面的注意力，同时竭尽全力损害中国国际声望，煽动反华国际舆论。2018年9月4日，太平洋岛国论坛在台湾所谓“邦交国”瑙鲁举行，会议召开前夕，瑙方要求按惯例与会的中方人员持普通护照入境，不接受外交护照。在大多数成员国和中方提出交涉，并表示将抵制会议的情况下，瑙鲁政府不得不同意中方代表团持外交护照与会。会议期间，瑙方再次不顾国际会议惯例，阻挠中方代表讲话，

^① 邢瑞利：《“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进展、挑战及应对》，《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3页。

^② 《中国被人安“新罪”：没有不折不扣接受国际秩序传统领导者的价值观》，<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5295724621747831&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2019年3月1日。

^③ 《澳新与太平洋岛国拟签新协议加强区域安全对抗中国介入》，《澳大利亚人》（中文版）2018年7月6日，<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8/07/06/8362/>，访问时间：2018年11月5日。

对此，中方当即提出严正交涉，并提前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出席会议的许多国家代表团也离开会场，对瑙方表示强烈不满。^①在澳大利亚总理没有出席会议并努力改善对话关系的情况下，台湾方面的干扰显然是中国政府遭遇外交羞辱的主要原因。此事发生后，国际媒体对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南太岛国重启外交斗争表现了相当的关注和紧张。^②

（二）对中国南太区域外交的展望

40余年来，中国对南太外交经历了从缺乏足够关注到逐步靠近中国外交核心舞台的过程。中国对南太外交的总体战略是在试错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对南太外交的基础，首先在于继续保证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能够有更多资源投向太平洋深处。其次，中国对南太外交应该秉持周边外交基本政策和原则，积极落实中共十九大以来一系列中央决策会议确定的对外政策理念和布局，在外交实践中注意充分了解对方国情，充实巩固提高既有成就，理性看待可能的矛盾。应从下列几个重点方面入手。

1. 避免与澳、新战略对抗

强调中方在维护既有国际自由贸易秩序上与其立场一致，不因部分合作案例的失败而动摇对全局的信心。同时，中方要加大外交宣传，尤其是丰富公共外交内容，增强沟通与解释说明，增强双方的共识。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需要认识到，南太乃至亚太地区所谓的既有秩序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也浸染了冷战对抗所规训的意识形态仇视与对立。在恪守开放合作与和平发展的基本原则下，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自然结果。

2. 提高自身能力与制度建设

首先，中国政界与学界要强化对南太国家尤其是各个岛国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外交等领域的具体研究，对不同国家形成不同的具体方案。同时推出最合理的项目，重视民生需要，加强环保意识。其次，中国自身要强化投资与援助的透明度，同时要加大宣传，强调对南太岛国的援助符合当地长远需求，而且更多是响应当地政府与社会需要的结果，并非中国试图有意操

^① 《瑙鲁多方干扰中方代表团与会 外交部回应》，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8_09_05_470917.s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1日。

^② 《瑙鲁办峰会刁难中国 中国特使披露与瑙鲁交锋实录》，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8/0908/07/DR5R3II90001875O.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30日。

纵。最后，发展吸纳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内的多边投资与合作，化解其焦虑，深入分析其援助与投资经验，减少我方不必要的成本和消耗。

3. 加大风险管控

首先是对澳、新政局变化及其对美立场的变化有持续稳定的跟踪研究，防止意外发生，以免外交活动陷入被动。但是，中国要始终清醒认识到，中澳关系波折对中国整体外交的负面影响不大。中国应该保持既有的战略，不轻易为消除政治杂音而全面回调双边整体关系，避免牺牲经济利益投入零碎杂乱的政治唇舌之争。其次依托战略支点国家，化解岛国群体的杂音。鉴于支点国家关系的巩固，我方可淡化该地区邦交承认问题，对顽固国家不做过分乐观的期待和争取，除非有重大现实意义，不主动接触。

4. 采取多元化而有的放矢的外交

尤其是对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国的战略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南太外交要拓展到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之外。尤其是强化人文交流，对澳、新主要是教育、科技和文化合作交流，对南太岛国则要更多采用全方位的民事援助与交流。

A Review on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South Pacific in the Past 70 Years

FEI Sheng

Abstract Although diplomacy with the South Pacific is a relatively weak link i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the status of this reg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uplifted in China's considerations of overall diplomacy work ever since the groundbreaking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is region in 1972. Particularly, tremend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oth the depth and the scope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is region, and a high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has been achieved in this field, ever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CP.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is diplomacy is an outcome resulting from the convergence of a series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ituations, the foreign policy adjustments of major South Pacific countries, and the more active involvements of China since its all-round rise. Based o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hina's diplomacy with South Pacific countries is focused on uplifting its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with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highlighted by a strengthening of its all-direc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with island countries of this region. In this way, China is achieving its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long-term stability on the situations of this region and establishing new pivoting points in the fronts of China's diplomacy. This region will become a new arena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diplomacy in future.

Key Words China; South Pacific; 70 Years; China's Diplomacy with South Pacific Countries

Author Fei S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h.D. Tutor at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er at Center for Oceania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